

潘菽心理学文选

江苏教育出版社



潘菽必理学文选

江苏教育出版社

潘菽心理学文选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2.125 插页5 字数552,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1—3,000册

ISBN7-5343-0104-1/G·97

统一书号: 2351·002 定价: 4.95元

责任编辑 孙峪峨



潘菽教授近影

八十书怀

望三岁月，忍八十春。
往者可谏，来者方生。
夕阳无限，灿若朝曦。
蓬勃郁葱，旧邦命新。
大同可望，寰宇沸腾。
我生此际，我生逢辰。
旋乾转坤，匹夫有份。
伏枥之心，云胡不奋！

潘 菽

一九七七
七月十三日

我的心理学历程

(代自序)

我走上心理学的道路有一半是偶然的。我在大学里读过一门心理学的课,但没有发生特殊的兴趣,只因为两个偶然的原因才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我在国外攻读的领域。不久就感觉到心理学确实是一门很重要而很需要好好研究的学科,虽然还是众说纷纭,连研究对象也没有定论,科学性也显得不够。但为此,我就一心爱上了它。到现在,我仍这样地认为,并更感觉到心理学必须有更多的人能刻苦地、忘我地、明智地去进行研究,作出颇不寻常的创造性工作,逐步提高它的科学性。我自己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中一直坚守在心理学的岗位上,抱有充分的信心,不屈不移,也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然而,虽不能说一事无成,但成就太少,离开自己向往的目标还很远。为什么?回顾起来,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我自己努力不够,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二是社会条件和社会风气还不利于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直到70年代后期,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外来的误解和阻碍仍没有完全消除。三是传统心理学本身还有不少根本问题,见解分歧,令人迷乱,矛盾纷纭,团结困难,内耗颇大,要改变这种局面,一时甚非易事。所以,我的心理学历程所能走的道路,并不是现成的康庄大道,而仿佛如山间之蹊径,颇为崎岖曲折,有时还要

披荆斩棘，再加上自己的冲劲不大，也有踌躇不前或遇到外来的障碍而停步的时候。因此，我在心理学上的整个历程可以说是颇艰辛的，前进的取得是颇费力的，速度是缓慢的。

这本文选所选录的从我早期到最近所写的几十篇文章，可以说就是我到今天为止的全部心理学历程所留下的先后有序的一些足印。由此可以看到我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的大概情况。我国心理学最近60年来的发展经过也许可以在我个人身上看到一个小小的侧面。这是我接受同行们、朋友们以及出版部门的提议，选择我在心理学方面所写的还不够成熟的文章交付正式出版的缘由。下面就把我的心理学历程分作几个阶段来作概略的介绍。每个阶段的时间只是大略如此。

十年定志

1921春，我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因一个偶然的公费留学机会，去美国学习。原想去学教育，希望回来后能对国家作一点有益的工作。到了旧金山，附近的加州大学的夏令学期正要开始。我就去那里暂住并报名入学，选读一些教育和心理学的课。我住的地方和蔡翘的住处相邻。于是我认识了他并从他那里得知当时美国心理学的一些情况。这样，我和蔡翘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郭任远也在那里读心理学，已是高年级的学生，并在毕业前就有实验研究的报告在美国的心理学期刊上发表。我从他那里对心理学有了一个较好的印象。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教育不一定适合于中国，不如学一种和教育有关的比较基本的学问，即心理学。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专学心理学了。蔡翘想转到一个心理学研究条件较好而又节省费用的大学。他选择了中西部印第安那州的州立大学，这也很合我的意思。于是就在初秋时和他一起进了那个大学。那时美国的大学都承认中国国立大学毕业生的学历。

无须考试,无须事先联系,只要开学时去报名交费。我作为研究生可随意选课。我在国内学了一门普通心理学性质的课,但和没有学过差不多。我对心理学的不少基础知识也一无所知。于是我下决心从头学起,和大学本科心理学系一年级的学生一样学起来。那里开的心理学课并不多,记得只学了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相比下前二门课很受益。那个大学的动物学也不差,我几乎学了所有的几门动物学课。也学了一门讲中等教育的课以了解一点美国教育的实际情况。那时教普通心理学的是康托教授。他是一个思想活跃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学见解。他讲课也用教本,用的是刚出版的吴伟士的那本心理学,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注意发挥他自己的理解。我对这样的教学感到颇合口味,受到了启发。加之,我同时阅读教本,故获益不少。教实验心理学课的是布克教授,他把这门全年的课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做实验上。布克先生只是在实验之前布置一下实验工作,说明一下所要注意的事项,完全不讲书本里的知识。每个实验所要参考的知识在实验指导书后面都列有几本参考书及有关的页码,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查阅。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很好。所有的实验我都和蔡翹一起很认真地做,并更认真地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中的“讨论”一项,我特别花工夫,查阅有关的书,细心地写出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体会,有时候还发一点议论。我的实验报告常得到“优”的批分。这是我所学的心理学课中最受益的一门。那种教法固然不差,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能充分发挥学习积极性。这使我长久难忘。我对在那里学的动物学也感到很满意,因为得到了我所必要的基本知识。这样,我的心理学的专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那里我也曾试图作硕士论文研究。我自己拟定的研究题目是“汉字的心理学研究”,因为我那时对汉字的改革问题已有了一点兴趣。但我对汉字除能识能写以外,知识很有限,只是有笼统地要研究它这样一个想法,至于怎样研究,

我却一时拿不定主意。做我的导师的康托先生当然无法帮助我。我曾向他说明我想做的研究的重要性。他也只能听我的，无法断言我的想法合适不合适。因此，到了期限，我的研究还是没有做出来，论文也就交不出来。但学校还是把我作为硕士研究生毕业，发给我硕士学位的文凭。这也不是太奇怪，因为那时美国有些大学可以让大学毕业生再进大学攻读两年，只要学习成绩较好，也可以不作硕士论文而授予硕士学位。

我在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两年后即转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蔡翘已于一年前转到那里。那里接受研究生也无须经过考试，只要在开学那天去报名选课，得到主任教授的同意就行。我到那里一开始就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以心理学为主科，动物学为副科。我跟从的导师是哈维·卡尔教授。他给我的一种影响是不盲从，不随风摇摆，脚踏实地，对问题富于分析批判精神。他在芝加哥大学心理系和华生是同学，并在那里一起工作一个时候。华生认为机能论心理学还前进不够，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机械客观论的影响，在心理学上走向偏重行为的观点，终于创建了他的行为论心理学，抛弃了意识。卡尔则继续守着机能心理学的岗位而有所发展。他时常提到意识和太阳光一样是不可否认的。他的这个论断也提醒了我。我在那里加读几门心理学课，其中有中级实验心理学、高级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体系心理学等。教中级实验心理学的教授有他自己的研究课题，所以他所布置的实验主要是利用学生做实验来收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对学生的益处不大。高级实验心理学也主要是实验方法的训练。只有体系心理学使我知道心理学的整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此外，在生物学方面我选修了胚胎学、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神经学和医学学生所必修的生理学。我在那里时，曾有“访问教授”来讲课。其中有著名的拉希莱和考夫卡教授。我听了拉希莱的课，在考试时我的考卷使他颇不满意。考夫卡的课现在完全记不起所讲的具体内容，不知为什么。只

能怪我自己吧。我在芝加哥的4年中真可以算是埋头学习，想尽可能多学一点东西带回国来。通过学习，对心理学多懂得了一点，对整个心理学的情况也多知道了一点。一方面觉得心理学确是一门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学科。一方面又觉得所有的著名学者对心理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各说各的，甚至有很大的分歧，还不大象一门科学。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由于两种理由：一是心理学确实难于成为科学；另一个是因为心理学确实比较高深而博大，使最有水平的学者也一时难于把它看得透，而容易陷于一偏之见。我那时多知道一点心理学，就多增加一点对心理学的信心，虽然我的信心可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我绝不相信心理学不能成为科学。世界中凡是实在的东西都能够对它们取得科学的认识。不能不承认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实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不承认心理学也必然能成为科学。心理学还不够科学，正需要我们对它加强开展科学的研究，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它所以长期不够科学的原因。因此，我在芝加哥的后期就开始模糊地意识到心理学是很有前途的，是研究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门很重要的科学，虽然当前还很不够科学，还必须大力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我自己既决定研究心理学，就必须付出一生的力量，为它的充分科学化而努力。因此，我感觉到对心理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科学知识除生物学外，物理和化学方面还很缺乏。因而想学一学所用得着的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但结果只学了一门化学。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使我没能完全学成就回国，这是我的一件憾事。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我自己拟定的。当我把这个研究课题告诉我的导师卡尔教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同意，并没有提其它的意见。这样，我就开始进行研究设计。我有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遇到问题尽可能自己思考解决，不轻易求助于别人，甚至老师。因此，曾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去找导师谈。当我去看他时，他稍许有些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这样久不来。我感到一惊，但只在脸色上和姿态

上表示了很大的抱歉，没有向他作解释。他一会儿也就平静了下来，象平常一样又和我谈了我的问题，对我的实验设计提了几点意见。我完全了解，他对我发的小小脾气是真诚关心我的研究工作的表现。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每年都要收好几个研究生，他都一一尽心指导，从研究课题的选定，实验的设计，一直到把实验结果写成论文。我的论文稿他作了细心的审改，包括文字上的斟酌。我的实验工作做得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主要是被试人数少了一点，数据不够。在论文答辩时，卡尔先生和两三位有关的教授在一个房间里讨论了一会儿，就出来告诉我通过了。我当然很高兴，但同时感到惭愧。答辩通过后不久，他就把我的论文送给一家心理学刊物去发表。似乎他倒比较赞赏我的这篇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在当时是有一定意义的，主要想说明S—R这个流行公式的两头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把它设想得太简单。美国大学对博士研究生到最后给不给学位似乎倒并不怎样十分严，他们可能也考虑到研究生平常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这些方面，而不单凭一篇论文。我在印第安那大学所遇到的上述情况似乎也是这样。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的论文答辩会的教授先生们稍许严一点，我就通不过，那我6年的努力至少有一半要付之流水，我的一点理想也要归于破灭。联想到我国现在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制度形式严格，但颇有不合理之处。弄得不好会起扼杀人才的作用。

我于1927年秋快快回国，不多久就被邀请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工作。这所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这个系的前身，就是东南大学于1920年建立的心理系。这个新大学的教育学院还另设一个教育心理学系。主持学校调整工作的人颇有远见。可惜后来的领导者见不及此。我先被聘为副教授，半年后改为教授。这样，我在国内得到了较好的心理学工作岗位，因而我和心理学的关系又进一步巩固了，再也不能

分离了。我回国之前，原想回来找一个助教一类的工作，以便能继续学习我还欠缺的基础知识。不料一回来就被安排在这样一个较高的位置上，这对于继续学习就颇不方便。不过也怪我自己没有决心。在后来的几年内我就安下了心，专力于心理学的工作，也写了好几篇小文章和一本小书，表达了我当时对心理学的见解。

十年彷徨

回国后不久就得到较好的对口工作岗位，我十分满意，以为此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专心一志钻研我的心理学了，至于社会上的事自有别人去管，用不着我去不务正业。我到美国不久，有一位我在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去了，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写信给我，邀我参加他已参加的国内的一个政治团体。我回信批评了他，意思是说，既然能来到美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好好学一点东西回去，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我初回国后仍抱着这种态度，成为一个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管理窗外的风吹草动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你不听它也会冲进你的耳朵，使你不免心惊色变。我那时也不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无所谓的人。我回到家乡县城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我的老兄梓年还在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县政府的工作。我曾跟他说我认为三民主义还不够彻底。所以有人邀我参加国民党，我拒绝了。我到南京一年以后，从旁听到江西方面“朱毛”领导的武装斗争声势很盛，南京方面去攻打部队弄得兵败将折。我对“朱毛”的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朱毛”是何许人，是怎样两个字。这说明我在那时对国家的政治局势是如何无知。但我觉得一时还不会影响到南京，故仍安然于岗位工作。再过两三年，突然听到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就

把我震醒了，再也难于一心抱着心理学而不关心国家大事了。这就使我在心理学的历程上开始产生彷徨，但我所钟爱的心理学仍要好好哺育。同时蒋政府在经济上的破绽也日益显露，学校的工资也要拖欠，研究费用和设备经费更谈不上，我预见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将难于实现。这是我在思想上产生彷徨的另一个原因。就心理学本身说，心理学的学派越来越多，还不大象一门科学。我原认为还是要通过实验的方法，好好把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进行认真完善的实验研究，取得可靠的结果，并根据各方面有关的科学知识来予以恰当的解释。这样，亦许可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在科学事实面前得到共同的认识并逐步趋于一致。我回国以后的最初几年中仍抱着这样的想法。后来根据我国那时的现实社会情况，逐渐感觉到，我那种想法是几乎完全不能实现的。以后又进一步感觉到，即使我的那种想法有条件能照着做，也未必能得到所期望的效果。因为人的心理也是事实，即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它们也都是事实。在同样的心理事实面前不同的心理学者竟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以至有很大的分歧，这就不是我原来设想的原因所能说明的了。而真正的原因，我却一时不能找到。这使我对心理学本身的问题也陷于彷徨无主的情况。在1933年夏，我去上海，我的老兄介绍我看一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译本。因时间不够，把它匆匆看了一遍，觉得这个译本的文句颇为晦涩难读，但也似懂非懂地领会到书中的许多论点对心理学很有启发意义。我从这里隐隐约约地看到心理学的出路所在，但这却更增加了我的彷徨。因为对心理学的前途似乎看到了一线新的曙光，但还很不明确，一时解决不了问题，而我对心理学原来的想法则等于受到了更大的挑战，以致有了两头无着落之感。但我对心理学的信心则毫无动摇，体会到此后的问题是要把自己的心理学工作做较大的方向调整，到马列主义方面找寻心理学的科学出路。

十年探路

抗日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中央大学全部迁往重庆，我也去了。由于估计错误，过于相信官方的情报，没有来得及把家属接去。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我单身在重庆。在这八九年紧张生活中，心神自难安定，一天到晚关心的是抗战形势的变化。前半阶段，敌机时常来轰炸，有时夜里也来，使人日夜难安，自然很难谈到研究工作。心理学教学工作则不能不坚持下去，但也只能把旧的知识一次一次重复着教。备课时间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总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听听、谈谈。一个较常去的地方是生活书店编辑部，那里是中国学术研究会停顿以后，它的自然科学组继续活动的地方。然而在那里谈的关于科学问题较少，关于时事问题较多，有时也谈谈新哲学中的辩证法问题，不过谈的不怎样深。另一处地方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我的老兄是那里的负责人，他的家也在那里。所以我去那里的时候更多。也时常和学校里或其它方面较接近的同事或朋友一起去，和那里搞编辑工作的同志谈谈，谈的主要是延安方面的情况，有时候是去参加他们的纪念会或庆祝会的，有时也应邀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看共产党方面驻重庆的或从别地方来的领导同志，或听他们关于某个问题的讲话。那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不少，时常有或大或小的集会，我虽然还够不上，但也常去参加或列席。学校里有几个可以相接近的同事听说我时常到《新华日报》馆去，以为我对延安方面的情况以及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一定知道得较多，要我和他们一起谈谈。他们当然对抗战局势的发展情况都非常关切，对延安方面的政治情况和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尤其关切。大家都仰望着延安，寄希望于延安。在一起谈了一次，大家觉得这样谈谈很有必要，约定下一次再谈。这样就形成一个经常的自发的校内座谈会，一共七八个

人。不久，相邻的重庆大学有一位同志和附近两个单位各有一位同志参加了进来。因为要尽量不让人知道，故此在重庆时一直没有再增加人。这个座谈会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名称，直到后来因为要和外面联系才称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因参加的人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照一种科学分类，心理学也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在抗战后期，经过好友黄国璋介绍，我开始到许德珩同志家里去走走，谈谈时事问题，并认识了许夫人劳君展同志。最初在一起谈的只有我们4人。稍后，我建议把原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税西恒同志邀来参加。他来时又带来一位他的朋友。此后谈的地点就常在税负责的自来水公司内或另找地方。这是我参加的另一个座谈会。接着，我又把学校内参加原来那个座谈会的同志中的大部分陆续介绍进来，也有由别人介绍参加的，共有30来人。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民主运动更加高涨的情况下，这个座谈会原拟名为“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但没有公开。有一次开会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9月3日，提到座谈会的名称问题时，我建议就用9月3日这个重大的世界性纪念日为名，称为“九三”座谈会。到了下一年，觉得势必要加强民主斗争，故又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以便参加势不能免的民主斗争运动。因此又征求更多的人参加，并于当年5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关于“学社”这个名称也曾经过一番考虑。认为“九三”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九三”成为政治团体后仍应本着这个宗旨。但这方面的知识分子在那时虽然很多人都有进步的要求，但又不愿沾政治的边。所以“九三”这个团体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较浓的名称，才可以使较多的人加入。这也是“九三”应起的主要作用。

另外，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和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在党的支持下还曾联合全国百余位科教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原来世界上已有一个“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是几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有这样的组织，那时在重庆的李约瑟是这个组织的一个主要分子。于是通过李约瑟的联系而建立了中国的这种组织。这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联系团结了更多的人，从而扩大了党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并为战后建设新中国作了必要的一种准备。我本人被推选在该组织中担任一定的组织领导工作，主编会刊《科学新闻》，并兼管财务。

以上的说明显出，我在抗战期间虽然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也差不多是一个栖栖惶惶、东奔西跑、荒疏正业的人了。不过，我的荒疏正业还有另一方面，一是我在那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喜欢看看各方面各地方所编辑出版的大小刊物，以期了解各方面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危难之中的思想态度。因此，我走过书店常要进去看看有什么新出版的刊物，如有总要每种买一二期回来翻看一下，有的买一两期就不再买了，有的多买几期，有极少数几种则常买。因此我积存的抗战期间各种刊物的“样本”颇不少。我还曾想把刊物上较好的或有代表性的文章剪下来准备编辑一二本抗战期间思想动态集这样的书。试做了一下，觉得要花费的时间太多，没有继续下去。二是虽然东跑西奔，关心各方面出现的刊物，但仍要读一点书。专业方面没有新书可读，也没有一定的读书目的，就到学校图书馆的书库中去浏览浏览，看到有兴趣的书就借出来读读。包括文字，古代小学教本，史书，古代石刻画像，古代装饰花纹，书册形式，周代的政府制度，等等方面。通过阅读，曾写成一本《乡事拾征》，写在一本旧式的帐簿上，十年动乱中遗失。三是写了一些应酬小文章。有些编辑向我约稿，有时原有某种见解要写，就答应了。这类大都是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但也时常有人约稿而没有东西可写，只能硬凑一篇。由此可见，我在抗战期间由一个心理学者变成了一个杂家。这样的情况有一半是由于无

可奈何，一半则是我以为应该那样做。譬如一个人正在读书，忽然发现房屋某处失了火，他抛开书本而去参加救火，这是很应该的。

就实际说，我在抗战期间几乎完全荒疏了心理学，但仍没有放弃心理学，仍坚守心理学岗位。在旁趋杂务，东奔西跑中，仍时刻想到心理学。我还曾编写所任普通心理学课的讲义，但半途而废。我过去是学术与政治分工论者。经过了抗战的洗礼，自以为变成一个学术与政治统一论者了。我此时主张不能为科学而科学，也不能为心理学而心理学。不过，学术对政治仍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难于得到很好的发展。心理学也是如此。我有一次去八路军办事处，看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问我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我对这句话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我说家属在沦陷区要我接济，去了解放区就更照顾不到了。他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要照顾家属是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我却没有说，那就是为了心理学我还是留在学校里比较合适。再者，我学校里那个座谈会其实也是一个学习会。大家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渴望能有所知道，尤其我从心理学方面看更有这个迫切要求。于是我们就制定计划，大都先自学同一种书，学习了一段然后聚会在一起，讨论讨论，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学习得深有体会的人则向大家多讲讲。我为了心理学，更有特殊的学习目的，所以也是比较积极学习的一个人。但我觉得自己在学习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学而难懂，进步很慢，在许多地方还是似懂非懂的。不过对我说还是学比不学好，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至少对后来的学习有了一点儿基础。就我的心理学而论，在八年抗战这个阶段里虽然谈不上有所长进，但我的学术观点开始有了转变，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最初步的认识。这对我的心理学研究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在1930年左右，有两位苏联心理学者各写了一篇介绍苏联心理学情况的文章，因为是英文本，也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心理学界的注意，知道苏联心理学在试图走和传统心理学不同的道路。其中